

海源阁刻书考

丁 延 峰

世人皆知海源阁藏书楼皮藏宏富,据王绍曾先生最新统计,其藏书达四千三百余部,十七万九千余卷^①;海源阁藏书重宋元佳槧,其镇阁之宝“四经四史”传为我国藏书史上一段佳话。其实,海源阁刻书亦成绩斐然,但多年来为藏书成就所掩,且偶或散见篇章中亦说法不一。笔者经过多方考证,终于摸清海源阁刻书之底蕴。笔者以为海源阁刻书虽不能与以专事刻书售书的汲古阁等相提并论,但以海源阁刻书之内容及质量而言,它同样为保存传播我国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刻书的种类、数量和规模

据近人李士钊考证海源阁刻书为二十三种^②;《中国藏书楼》为十八种^③;王绍曾先生为二十八种^④;笔者又从《崇祀乡贤录》(台北中央图书馆藏)、《退思庐文存》、《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瞿冕良编著,齐鲁书社,1999年)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共蒐集到六种,如以此再把王氏二十八种与杨刻地理图籍五种相加共三十九种应是目前确切数字(其中笔者目验三十二种,收藏影印原刻本九种)。但从海源阁刻书状况及随着对海源阁研究的深入,这一数字恐怕不是最终数字。此次考证发现了如以前著录过但并未公布于世的如《夏小正》、《急就章》等(载《崇祀乡贤录》);以前著录过但不知藏所及

版刻情况的,这次查到藏所并得以目验的如《思退堂诗钞》、《石笥山房集》、《礼理篇》、《六艺堂诗礼七编》等,尤其如《应潜斋先生集》著录出处相当偏僻(《中国版刻辞典》、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电子检索目录),也得以目验,又如《蕉声馆集》于南图发现杨刻本,有杨以增手写序言,极为珍贵,经鉴定与藏于鲁图的《笏山诗集》、《渊雅堂集》的杨氏另附白纸手写跋语笔迹一样;以前从未见诸著录但有原书且目验者如《柳真君劝孝歌》、《答方彦闻书》等。这些刻本作为善本有的现在仍存于图书馆,有的未能看到但有藏书目录或其他资料以资考证。现据掌握的材料整理成附表《海源阁杨氏刻书知见录》,以供同好了解海源阁杨氏刻书情况。

海源阁杨氏刻书知见录

刻书主人	书名卷数	刻书年代	版框和行款	著录或见存	刻书地点
杨以增 翟云升 陈官俊	隶篇 15 卷 续编 15 卷 再编 15 卷	道光 18 年 (1838)	23.5 × 15.8cm, 14 行 25 字, 白口, 左右双边, 单黑鱼尾	退思庐文存、杨以增序、李氏简述刘氏概述 ^[1] , 南图等	山东掖县
杨以增	说文解字义证 1 册	道光 22 年 (1842)		杨至堂八通书 ^[2]	山东济宁
同上	方輿考证总目 1 册	道光 22 年 (1842)		杨至堂八通书	同上
杨以增 李炜	牧令书 23 卷, 保甲书 4 卷	道光 28 年 (1848)	19.1 × 13.6cm, 10 行 25 字, 白口, 左右双边, 单黑鱼尾	李氏简述、刘氏概述、杨以增序, 南图	
杨以增	思退堂诗钞 12 卷, 青琅玕吟馆词钞 1 卷	道光 30 年 (1850) 10 月	19 × 14cm, 9 行 21 字, 白口, 左右双边, 单黑鱼尾	退思庐文存, 杨以增序, 鲁图藏目 ^[3] , 鲁图 ^[4]	江苏清江浦 (今淮安)

同上	赋则 4 卷	道光年间	17.7 ×13.6cm, 9 行 24 字, 白口, 四周双边, 单黑鱼尾	鲁图藏目, 鲁图	
同上	禹贡九州图 1 册	咸丰元年 (1851)		鲁图、聊城海源阁纪念馆, 承训捐 ^[5]	江苏清江浦
同上	恒星赤道图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皇朝一统图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万国地球图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今释古今图(此以上 4 种 8 册)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柳真君劝孝歌 1 卷	咸丰 2 年 2 月	15.7 ×10.9cm, 8 行 12 字, 白口, 左右双边, 单黑鱼尾	中科院图书馆	同上
同上	蕉声馆集 8 卷	咸丰 2 年 3 月	16.8 ×13.5cm, 12 行 24 字, 白口, 左右双边, 单黑鱼尾	退思庐文存, 杨以增序, 南图	同上
同上	石笥山房集 23 卷	咸丰 2 年 3 月	16.8 ×12.4cm, 10 行 20 字, 白口, 四周双边, 单黑鱼尾	清集别录 ^[6] 、续修四库、总目提要 ^[7] 、杨序等, 鲁图、南图、国图等	同上

同上	蔡中郎集 17卷 [图一]	咸丰2年	19.2×13.3cm,9行 18字,白口,左右 双边,单黑鱼尾	丛书综录 ^[8] 等,国图、华 东师大、南 大等	同上
同上	三续千字 文注1卷	同上	19.5×13.5cm,10 行23字,白口, 四周双边,双黑 鱼尾	丛书综录, 国图、华东 师大、鲁图 等	同上
同上	九水山房 文存2卷	同上	18.5×13.5cm,9 行21字,大黑 口,四周双边,单 黑鱼尾	丛书综录、 清集索引 ^[9] 等,国图、 南大、鲁图 等	同上
同上	六艺堂诗 礼七编16 卷	同上	18.65×12.85cm, 10行22字,白 口,左右双边,单 黑鱼尾	海源阁书 目、丛书题 识 ^[10] ,鲁图 (残)	同上
同上	六艺纲目 2卷附录 2卷	咸丰3 年	22×13.5cm,9行 19字,左右双 边,白口,单黑鱼 尾	丛书综录, 鲁图、南大 等	同上
同上	礼理篇 (《复礼》, 1卷	同上	19×13.5cm,9行 21字,小字双行 同,大黑口,四周 双边,单黑鱼尾	中科院图 书馆、国图	同上
同上	张彦惟答 方彦闻书 1卷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志学箴 1 卷	同上	19×13.5cm, 5 行 20 字, 经文每行 3 字, 下疏证双行每行 14 字, 大黑口, 四周双边, 单黑鱼尾	同上	同上
同上	应谦斋先生集 10 卷	咸丰 4 年 11 月	17 ×12.5cm, 10 行 21 字, 白口, 左右双边, 单黑鱼尾	中国古籍版刻辞典, 南图	同上
杨以增 杨绍穀 杨绍和	柏枧山房文集 16 卷、集 31 卷本、集 31 卷补刻本	咸丰 5 年 7 月咸丰 6 年 3 月同治 3 年 (1864)	18.1 ×13.8cm, 10 行 21 字, 白口, 四周双边, 单黑鱼尾	清人别集总目、清集索引等, 南大、国图、川大等	同上
杨以增	助字辨略 5 卷	咸丰 5 年 (1855) 9 月	19.2×13cm, 9 行 21 字, 左右双边, 白口, 单黑鱼尾	丛书综录, 国图、中科院图书馆、鲁图等	同上
杨以增 高均儒 (手写)	惜抱先生尺牋 8 卷 [图二]	咸丰 5 年 9 月	19.2 ×13.1cm, 9 行 18 字, 白口, 左右双边, 单黑鱼尾	丛书综录, 中科院图书馆等	同上
杨以增 高均儒 (手写)	跋溪年谱 1 卷	咸丰 6 年	22×13.5cm, 8 行 16 字, 四周单边, 小字双行同, 栏外记页数	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 国图	同上

丁延峰:海源阁刻书考

杨以增 胡珽	尔雅郭注 义疏 20 卷	咸丰 6 年	19.3×13.5cm, 9 行 21 字, 小字双 行同, 大黑口, 左 右双边, 单黑鱼 尾	鲁图藏目, 鲁图	同上
杨以增	吕氏家塾 读诗记 32 卷续 3 卷	清末杨氏 海源阁刻 本。	20.3×13cm, 10 行 20 字, 小字双 行同, 白口, 四周 双边, 单黑鱼尾	海源阁书目、李 氏简述、刘氏概 述, 南图	同上
杨绍和 杨敬夫	退思庐文 存 1 卷	咸丰 10 年 民国 9 年 (1920)	18.1×13.9cm, 9 行 21 字, 大黑 口, 四周双边, 单 黑鱼尾	鲁图藏目、丛书 广录 ^[11] , 鲁图、 中科院图书馆、 青图等	山东聊 城
杨保彝	唐求诗集 1 卷, 附录 1 卷	光绪 20 年 (1894)	17.2×13.2cm, 10 行 18 字, 白口, 左右双边, 单黑 鱼尾	鲁图藏目, 鲁图 等	北京
同上	楹书隅录 初编 5 卷 续编 4 卷	光绪 20 年 光绪 21 年	17.8×12.5cm, 9 行 21 字, 白口, 左右双边, 单黑 鱼尾	鲁图藏目, 中科 院图书馆、鲁 图、国图等	同上
杨敬夫	仪晋观堂 诗钞 1 卷	民国 9 年	18.1×13.9cm, 9 行 21 字, 大黑 口, 四周双边, 单 黑鱼尾	鲁图藏目, 中科 院图书馆、鲁 图、南开等	山东聊 城
同上	归瓶斋诗 词钞 1 卷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杨以增	灵棋经 2 卷			李氏简述、刘氏 概述、杨以增序	
同上	夏小正			崇祀乡贤录(事 实)	

同上	急就章			同上	
同上	小仓山房尺牋			李氏简述、刘氏概述	
同上	艺舟双楫			同上	

表注:

[1]李士钊:《聊城海源阁藏书刻书简述》,载《山东出版志资料》第一辑,1984年;刘文生:《海源阁藏书概述》,载《聊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2]王献唐编著:《杨至堂致许印林书八通》,载《顾黄书寮杂录》,齐鲁书社,1984年出版。

[3]山东省图书馆编:《山东省图书馆馆藏海源阁书目》,齐鲁书社,1999年出版。

[4]山东省图书馆古籍部,海源阁特藏书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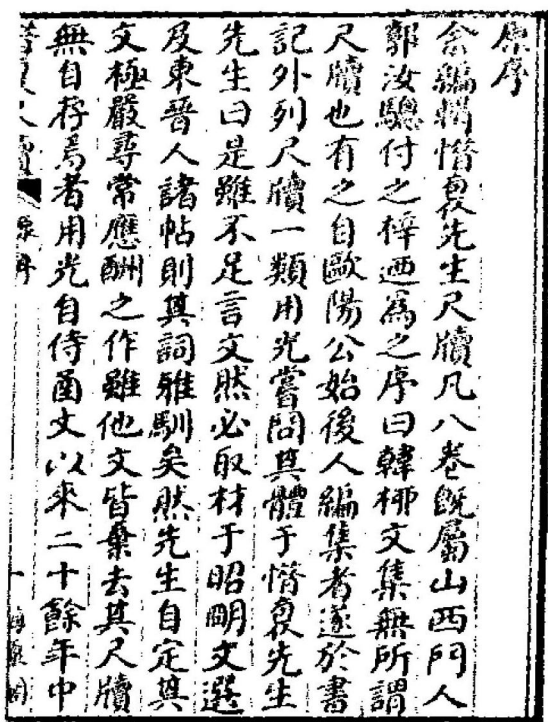
[5]李士钊:《杨承训为兴建“海源阁纪念馆”捐献重要图书文物》,载聊城师范学院图书馆编《海源阁研究资料》。

[6]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敘
中郎集隋志載十二卷注曰梁有二十卷錄一卷唐志仍載二十卷宋志載十卷則今之傳本十卷已爲近古以增少業是集心好之而所見之本或六卷或八卷或二卷互有錯忤苦無善本對勘曩歲庚戌始購得黃薏圃顧澗蘋合校明萬歷閒陳畱令徐成庵所刻有宋天聖閒歐識之敘之十卷本又外紀一卷補十卷之遺其所據校者一爲葉氏樸學齋所藏舊鈔本一爲

咸豐二年東郡楊氏海源閣仿宋刊

[图一]



〔图二〕



〔7〕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

〔8〕《中国丛书综录》收录海源阁“丛书”六种，并载此六种北图、科学院、上海、华东师大、南京、南大、河南图书馆等均全种收藏，但据查有误，吉大、重庆、山东

图书馆有残本收藏，其中鲁图存五种。

〔9〕王重民等：《清代文集分类索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10〕施廷镛编：《中国丛书题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11〕阳海清编：《中国丛书广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上表基本上是按时间排列的，无年代可考者放在后面，这样可以看出杨氏刻书的演变情况，如兴衰变化、时地迁移、刻书者更替，而版式、藏所及出处也一目了然。就杨氏刻书种类而言，计经部十种，史部九种，子部六种，集部十四种，以经部、集部为多。卷数共三百一十二卷，另有十一种十一册及不知卷数册数者五种，这一种类数量与清代同时期其他私刻家相比，虽不及著名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知不足斋丛书》、《平津馆丛书》，但比起《抱经堂丛书》、《士礼居丛书》来又多不少。故海源阁杨氏刻书在规模上于清代私刻史上应属中上。就质量而言（见下论述），杨氏所刻书籍大都被著名书目所著录，如《中国丛书综录》、《清人别集总目》、《续修四库全书》等，其中有不少如《柏枧山房集》、《蔡中郎集》、《楹书隅录》等已成善

本、孤本,是集流传独赖杨刻。

二、丛书说与版式特点

所谓“丛书”是指“按照一定的原则,采用相同的物质形式(如一样的版面、一样的装订形式等),把一些著作汇刊在一起的系列书籍。”^⑤但杨氏“丛书”在以上诸方面并不一致。仅考其版式,除杨氏三代诗文、《九水山房文存》版式基本一致外,其余则均不同,故从版本学意义上讲并不能视为丛书。抑或考虑到这个因素,故杨氏三代先人并无丛书之说,而第四代主人杨敬夫于1920年刻三代诗文时为《退思庐文存》所作跋语亦无丛书说法,直到1966年2月10日杨敬夫在接受李士钊访问时始称1920年续刻杨氏三代诗文为丛书^⑥,而且在此杨敬夫实际上是把杨氏所刻书籍都视为“丛书”,此后李士钊、刘文生等都依敬夫说法,但以刻书主人作为丛书标准是一种很笼统的做法。杨氏刻书实际上是随刻随售,待刻到一定数量时再捆绑批售,因有丛书“五种”、“六种”之说,如南大藏“三种”,科学院藏“四种”,南图藏“五种”,195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收录海源阁丛书“六种”。“六种”之说最早见于文字记载者是王献唐先生在1930年发表的《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载于《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一种》)一文中:“海源阁校刻书籍,除《楹书隅录》正续编外,尚有杨志堂汇刻之海源阁丛书,兹录原目如下:……(‘六种’目录略)”此后诸家引用不缀。但即使是刻于同一时期同一地方的“丛书六种”其版式亦不同。目验这“六种”除皆为九行本和版心下镌“海源阁”外,其他如版框、行字数、书口、边栏等均不同,而仅有九行本是不能全面揭示丛书特征的,版心下镌“海源阁”也仅是说明是书为杨刻而已,亦并不是丛书的标准,杨氏所刻其他书版差别更大,故杨刻“海源阁丛书”并非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丛书。王绍曾先生曾言:“据山东图书馆编馆藏《海源阁书目》于《退思庐文存》、《仪晋观堂诗抄》、《归瓶斋诗词抄》下,均加注《海源阁丛

书》,谅必有根据。然据余目验杨刻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亦无《海源阁丛书》字样,版式亦与《海源阁丛书》不类。”^⑦王先生对山东图书馆编目录“丛书说”似亦不赞成。造成杨刻版式“混乱”的原因,是因杨刻在刻时、刻地等方面存有很大不同所致,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杨氏先人并无出版丛书的打算。

“乾嘉以来,清代私家刻书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大量刻印丛书,一是请名家写样上版。”^⑧杨氏所刻“丛书”数量已知。延请名家写样上版杨以增亦不例外,如清代著名校勘家、书法家包世臣、高均儒共事于杨氏门下数年之久,杨氏所刻书籍,多经其手。王献唐曰:“得嘉兴高均儒致慎伯手札,又见吾乡许印林与王某友函稿,及校本杨刻《蔡中郎集》题辞,始悉杨氏幕中,其治校勘、版本学者,最推高君,……海源阁所刻书籍,多出高君校勘,《惜抱尺牍》一书,即高氏手写付梓。”^⑨梅曾亮于杨刻《惜抱先生尺牍》序中又言:“因以新城陈氏刊本,延高君伯平重为校刊。伯平遂悉手写之于以版,字体浑穆,使此书益可钦玩。”高氏另一杨刻手写刻本是《跛溪年谱》,目验版式疏朗阔大,字大如钱,浑厚饱满,文字之美确如梅氏所言,故两书传之于今,高氏功不可没也。除此,仿刻宋元本也是杨刻之重要特点,如仿宋本《蔡中郎集》、《三续千字文注》、《唐求诗集》、仿元本《六艺纲目》等,毛春翔、李保民曾在《近三百年版刻述略》(载《古书版本常谈》)中盛赞《蔡中郎集》为“清代仿宋元影刻本中的经典之作”。由于杨氏刻书以学为先次之公开销售,故刻具有学术价值作品居多;且有选书严谨、校勘精审、印制精美之特点,故赢得世人口碑。

三、刊刻时间、地点之迁移

关于刊刻时间、地点,也是杨氏刻书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杨氏刻书贯穿四代,历时近八十年,刻地亦屡经迁移。杨以增第一次刻书,是在道光十七年五月,与同邑翟云升、陈官俊联合刊刻《隶篇》,

是书由东莱翟云升撰著。陈官俊在此书序言中说：“先是聊城杨东樵(以增)观察闻文泉(云升)有是作,尝欲为梓行,乃合谋而同郡邑诸戚好及一时矩公,官吾东者又乐与赞成焉,……去年(1837)夏五月遣工抵莱(东莱,即山东掖县),……越年余而工告竣。”扉页书牌“道光十七年五月开雕十八年六月成”。翟云升在《隶篇续再续》序中亦说:“因……以增高资鋟镂”,杨以增也撰序力赞此书之佳。第二次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此时,他在河南开、归、陈、许任道员,为刊行曲阜桂未谷先生《说文解字义证》,曾写信请在济宁主讲渔山书院的著名校勘家许翰为之董理校勘,信言:“桂未谷先生著有《说文义证》,原稿存曲阜孝廉孔茜华家。此老一生心血,皆在是书。弟欲代为刊行,而苦于不能校正。因与孟慈太守言及阁下精于六书之学,敢烦先生觅抄胥,逐一校正,然后付诸剞劂,久远流传,可无遗憾。”^⑩许翰受请后开校此书,并拟《说文解字义证校例》寄杨氏。后因以增奉旨调陕,闻桂书另有他刊,《义证》仅于济宁刻一册后中止。杨以增大量刻书是在其升任江南河道总督(1848)后的八、九年里。这一时期有具体刻年可考者二十四种,其中刻于道光年间及道光三十年各一种;咸丰元年五种;咸丰二年七种;咸丰三年四种;咸丰四年一种;咸丰五年二种;咸丰六年三种;属于咸丰六年的三种刻本是杨以增生前已刻但未完,又嘱其子绍和与幕客续刻。如《跛溪年谱》高均儒跋曰:“聊城叶石农先生没后三十有四年,其高业弟子杨侍郎……复以先生自编年谱属均儒书付诸版,……谱刻成而侍郎不及见。……恻为之跋,咸丰六年正月下旬闽高均儒书于南清河寓所。”又绍穀、绍和于《柏枧山房文续集》之后题识曰:“先君子(杨以增)校刊伯言先生文集既成,续校诗集、骈体文,刊未及半先君子薨。……不数日,先生(梅曾亮)亦卒,是为咸丰六年正月十二日,距先君子薨仅二十四日。呜呼!迨穀等促工刊藏诗及骈体十五卷,都文集为三十一卷,先生已不及见矣。”另有七种虽刻年无考,据记载亦为杨以增所刻,但大多为此时所刻无疑。这一时期

的刊刻地点是在江苏清江浦(即今江苏淮安)江南河道总督署内。署内后院有荷芳书院,历届河督皆以此院为学之场所,以增、绍和父子闲暇时在此赏书读书,咸丰辛亥元年(1851)陶小丰曾绘绍和画像《荷芳书院读书图》横幅。江标在《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跋》中言:“吾郡黄尧圃先生所藏书,晚年尽以归之汪闾源观察。未几平阳书库扃钥亦疏,在咸丰辛亥、壬子(1852)间,往往为聊城杨端勤公所得。”而杨氏大量刻书亦始于此时此地。这时其幕客包世臣、版本学家高钧儒均在其帐下襄办藏书鉴书和刻书任务,吴昆田在《续东轩遗集》(光绪七年刻本)序言中说:“咸丰间河帅杨至堂侍郎刻书延主(均儒)校勘,极相契重……”而同年友梅曾亮于1854年亦来此襄助。清江浦作为河淮交汇之处,经济、文化繁荣兴旺,刻书业亦很发达,当时就有很多知名书院承担刻书任务,作为河督又酷爱聚书的杨以增与其子绍和及幕僚等亦于河督署内荷芳书院刻了大量著作。《跛溪年谱》卷末高均儒跋于“南清河寓所”。《六艺堂诗礼七编》卷首杨以增“叙于南河节署”,《七编》之一《郑氏诗谱考正》亦题“清杨氏南河书署刻本”,王献唐题识曰:“丁氏此书,封面题杨至堂先生鉴定,又题南河节署刊版。与海源阁刻《九水山房文存》等纸墨书体略同。时杨至堂官河漕总督,刻书皆在署中。”^⑩考《柏枧山房集》蒋国榜补修本《题辞》曰:“甲寅(民国三年)春,国榜始为《金陵丛刊》,乙卯(民国四年)四月复得《柏枧山房全集》板片于淮上……。”亦证此事。盖杨氏逝后其书版散落:一部分运回聊城(见下文);一部分散落民间,如《柏枧山房集》同治三年补刻三十一卷本,时补刻本刻毕,其版片便散于清江、淮上,并未携聊城;余之归著者或其他书商,王献唐于《郑氏诗谱考正》又题曰:“刻成之后,殆以版归丁氏。后因编入《颐志斋丛书》(三十四种),别易封面,只题书名,无上下二行……,卷末又题——扬州钞关大儒坊碧山堂柏刊,海源阁书刻既与此同,知亦多由碧山重雕版。”^⑪王献唐还在《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中言:“(海源阁丛书六种)以上书版,原存

北平,闻已毁于火灾,校订刻印,俱极精审。”据王氏所言(1929年11月赴聊清查遭佚书籍时闻杨宅仆人言),“丛书六种”书版疑由绍和自清江浦运至聊城,至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居京官时又携至京城续刻,1900年庚子事变遭焚后又由保彝将残片运聊。由以上知,海源阁刻书之鼎盛时期确在于此。

但杨氏家族刻书此后并未中止,以增次子绍和先后于清江浦、聊城等地,一边为父处理后事,一边又续刻父生前未刻完之书,《聊城县志·杨绍和传》卷八载:“(绍和)生前笃于师友,如刘渔村、梅伯言、包慎伯,故后均刻其著作行世。”《柏枧山房集》三十一卷同治三年(1864)补刻本即是。咸丰十年(1860),绍和于为官百忙之时又于家乡聊城编辑刻成父撰《退思庐文存》一卷,收录序跋记传十三篇。此书印数颇多,销售极广,仅山东省图书馆就藏有咸丰十年刻本复本五部。同治癸亥、甲子年(1863、1864),绍和里居时,开始撰写《楹书隅录》。作为我国清末著名题解目录之一的《楹书隅录》不只是在杨氏刻书史中,即使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地位亦不一般,柯劭忞于《楹书隅录》跋曰:“杨氏以藏书为世业,宋槧元钞,集诸家之大成,故藏弃之富,鉴别之审,海内推先生(绍和)第一。”绍和保彝父子从撰校到刊刻《楹书隅录》历时达三十一年,光绪十九年(1893)小阳时,杨保彝于京付梓,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既望刊成,为字十四万四千二百四十有二言。光绪二十一年再版。海源阁第四代主人杨承训言:“此书付刻时,原定由先妣王太夫人与吉鹤慈表兄校对,殆刻将近半,则吉表兄回至原籍料理家务,而校对之事,遂由太夫人一人负责,以迄刊竣,先观察公拟著先太夫人之名于书后,叙中而卒未刻名。及书印成后,复校出三处有四个错字,遂用木刻红字盖在错字上,未及修正。”^⑮从此书所藏、撰校、刊刻之经过来看,父未竟,子继之,并有王氏少珊亲自校正并著刊刻事务,杨家几代都把藏书编书刻书作为传世事业,均以毕生精力付诸于成,他们都耗费不少心血,其精神实堪称赞。同一时期,即在光绪二十年

(1894),杨保彝于北京又刻印《唐求诗集》两卷。

杨氏刻书之最后是在民国时期,刊刻地址在其聊城藏书大本营海源阁内。杨承训说:“民国九年庚申(1920)我二十岁的时候,曾经手刻印了《海源阁丛书》的最后三种,即杨氏三代先人的诗文集。第一是先曾祖至堂先生的文集《退思庐文存》,其次是先祖父协卿先生的诗集《仪晋观堂诗钞》,以及先父风阿先生的诗词集《归瓶斋诗词钞》三种书,都是在1920年之内完成刻制和印刷的。因为杨氏四代人都爱书,杨氏自己所刻印的《海源阁丛书》数量很多,我自己乃把个人所见存的三代先人的的文稿,汇辑起来刻印成书,既可以保存先人的文献资料,又可以馈赠亲友们作为珍贵的礼品加以存藏。”^④此次承训汇刻《聊城杨氏三代诗文集》三卷其中《退思庐文存》属第二次刻印。《退思庐文存》一卷首刻于咸丰十年(1860),再版时又补入《补遗》两篇、《附》两篇、承训跋一篇,跋曰:“……其见于书刻叙跋者寥寥十数篇,而止余小子守残抱缺,尽焉伤之。爰就所及见者,汇钞成帙,以为手泽之存,犹惧其久而散佚也。谨将前钞遗文十三篇并续蒐辑二篇附以《家传》、《墓志》共付剞劂,以扬先芬而永世泽。”《仪晋观堂诗钞》一卷收录杨绍和一百三十八篇诗作;《归瓶斋诗词钞》一卷收录保彝诗词四十六首。刻此书时,主持人杨承训正于家(聊城)读书,师从聊城宿儒靳维熙(约斋)。靳与风阿为总角交,曾任《山东通志》局莒、宣统二年《聊城县志》总纂,学识渊博,导以读古书,讲述杨氏几代前人的治学和藏书事迹,承训受其启发萌发汇刻之事,与家母王太夫人商量,家母非常同意承训的设想。从李福奎题识中又得知承训汇刻是书还得到李氏不少帮助。李福奎,济南人,杨以增外孙,为当地宿儒,李氏于《归瓶斋诗词钞》卷末识曰:“余既徇,哲嗣敬夫之请为编其次第,录成定本,待付剞劂。”如此经多方努力终于事成,杨氏三代诗文遂以流传。

关于刻版方式,杨氏刻书不仅用木刻雕印,还用活字印刷。所用书版有些是从清江浦运来,有些是杨氏后人自制,后都藏于聊城

城内杨宅,“1930年,聊城迭遭土匪占据后,……所有杨氏四代人历年所刻制的《海源阁丛书》的书版,也都全部运到田庄收存”^⑤,包括各种木刻版书和活字版木字,与铁范等全部印刷工具。谙熟聊城书坛掌故的吴云涛老先生曾于1964年回忆道:“一九三九年之间,我曾在杨氏的‘弘农丙舍’别业见到过存在的大批木刻活字。还有很多块特制的排版木框,凌乱地和木具杂物堆在一座空房子里,因而可以证明了杨氏《海源阁丛书》,是确在聊城出版过一部分,其中有几种,是拿活字印刷的。”^⑥经过他的查验判断并加断言:聊城刻书如著名的书坊“书业德”、“有益堂”、“善成堂”等皆用木版雕刻印书,“至于拿‘活字版’印书,这里的书店,还没有过,只有本城杨氏私家出版的‘海源阁丛书’,内有一部分,有雕版印刷,也有用‘活字版’排印的。”(同上)

杨氏刻书后人又有复刻、重刻、补刻本五种:《杨氏三代诗文集》民国九年杨敬夫汇刻本;《楹书隅录》宣统三年武进董康于北京海王村谭宅刷印之补刻本;《三续千字文注》武进盛宣怀据杨本重刻;《蔡中郎集》广东陶氏据杨本重刻;《柏枧山房集》1917年上元蒋国榜有补修本;“丛书”六种1990年江苏广陵书局(扬州)有影刻本。由此可见杨刻影响之大,杨氏刻书历八十年坎坷风雨距今亦有八十余年,但它一如“南瞿北杨”庋藏之盛名,理为清季江北之刻书文化之甲观。不过人们又往往有一种错觉,即使饱学如傅增湘先生,在《礪墨亭丛书》(稿本)题记(载《双鉴楼藏书续记》卷下)中,深感嘉乾以后南方刻书之盛,而“北地则声闻寂寞”,已故文献家谢国桢先生也说:“冀北鲁东,文物之邦,犹未有刻书之风。”^⑦但仅以杨氏刻书事实证之,此言不妥。以杨氏刻书之质量与数量,在我国出版史尤其是清代私家刻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应是名副其实。冀淑英言:“犹幸我国民间藏书,自有传统,代代相传,绵连不绝,有助于今日灿烂丰厚传统文化之形成。”^⑧杨氏刻书亦然。

注:

①《后记》,④⑦《杨氏五世传略及海源阁藏书概述》,均载《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齐鲁书社,2002年。

②《聊城海源阁藏书刻书简述》,载《山东出版志资料》第一辑,1984年。

③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第158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⑤⑧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篇》第185页、第189页,齐鲁书社,2001年。

⑥⑭⑮李士钊:《访问海源阁第四代主人杨承训》,载《山东出版志资料》,2001年第一辑,1984年。

⑨王献唐:《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载《山东省立图书馆丛书》第一种,1930年。

⑩王献唐编著:《杨至堂致许印林书八通》,载《顾黄书寮杂录》齐鲁书社,1984年。

⑪⑫王献唐:《双行精舍书跋辑存·海源阁遗书题跋》,齐鲁书社,1984年。

⑬刘文生:《海源阁藏书概述》,载《聊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⑯吴云涛:《聊城刻书出版业简史》,载《聊城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⑰谢国桢:《丛书刊刻源流考》,载《明清笔记谈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17页。

⑱《山东省图书馆〈海源阁书目〉序》,载山东省图书馆馆藏《海源阁书目》卷首。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